

五四后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状况述评

刘长林

民国建立后，为了使中国真正步入现代社会，夯实建立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然而，由于民初宪政的失败与现实政治的黑暗；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弊病，以及苏俄革命的成功向中国人展现的另一种建立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的吸引，以反帝爱国为主要政治诉求并以社会大众直接参与性质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及其成功，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有了极为鲜明的转向，即由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向以社会革命为主要诉求的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主流问题意识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关注国家政治一变而为一“社会”为根本问题。[1] 陈独秀在1919年底宣称，“近代思潮”是“国家的”，而“最近代思潮”是“社会的而非国家的”，“社会问题”是“世界公同之一问题”，[2]“社会改造”或“改造社会”成了思想界和舆论界时髦的词语，社会改造成了舆论的中心话题。对于五四后期（1919年“五四运动”后到1924年“国民革命”的兴起）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及社会改造的不同思想路向，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怎样？存在的问题有哪些，需要怎样的突破？本文作以述评。

一、五四后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及新文化阵营思想分裂的原因。

对于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当事人胡适曾说，从将新文化运动看成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来看，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使文化运动有了明显的转向。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他的朋友陈独秀放弃了初期从事的思想文化运动，转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的道路上来。胡适也将陈独秀等人看成是“我的主要反对派的共产主义者”。[3]胡适也打破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律，开始谈政治和社会改造问题。同时，正在进行的東西文化论战在社会改造思潮兴起后更加深入，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被陈独秀质问而处于被动时，随着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4]特别是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5]宣称中国文化将在最近的未来复兴，东方文化派又活跃起来，重视文化、精神等因素在社会改造及现代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的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开始诞生。当时思想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新旧问题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妇女问题讨论、宗教问题讨论，思想论争高潮迭起，讨论的中心都与社会改造有关。同时，各种报刊也在五四运动后纷纷创刊，发刊词中纷纷以社会改造为主题，有的就以改造为刊名，呈现出思想观点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

对于社会思潮兴起的原因，主要的观点有：（1）归于东西文化的接触，世界范围社会改造思想的影响。对这一思潮较早研究的杨铨，明确提出“自东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社会之思想经一大变化”。中国近代社会改造思想是西哲之新说输入后形成的，始于近五十年中，他将民国前的社会改造思想分为革命派与立宪派，民国以后的分为“安纳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民党、研究系、好政府主义、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作了简要介绍，并认为大多处于空谈的层面，对于中国社会缺少深刻的观察。而社会改造需要伟大的人格，对社会深入研究与奋斗为基础。其论述较简略。[6]诸青来以《社会改造问题》为书名[7]，对当时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孰得孰失，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沿革，社会主义作了批评，范围不限于中国所发生的社会改造思潮。这是一部较早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专著。这部著作主要从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优劣展开，说明中国社会改造思潮与世界范围的社会改造思潮是密切相关的。胡绳认为是受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影响。一战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使人们思考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建设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变化对中国思想界的震动是巨大的。[8]

（2）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仅个性解放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五四后转向社会改造的原因。金冲及从马克思主义个人和社会关系、个人解放与全体劳动人民解放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是个人的解放，但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而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五四运动后，改造社会的问题被思想界广泛关注，这在近代中国还是第一次。[9]这相比将五四运动真实的主题说成是“呼吁中国人的现代化，通过人的革新，来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造，”[10]以及将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里程碑，在于其“思想行为层次”[11]的说法要进一步，因为这些说法没有关注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新动向。

（3）认为社会改造思潮是新旧文化运动交替时期发生的。认为是主张社会革命、根本解决，还是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改造社会中的两种不同主张”。[12]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是被作为改造社会的思潮介绍和评价的。“工读互助团”等“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导致了进步青年改造社会的直接行动”，“并得以在比较和鉴别中进一步接受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完成思想上的根本转变”。[13]对于当时在社会改造思潮高涨时期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则一笔带过，论述不祥。

（4）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反思近百年思想史变迁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由于五四运动后的几年对中国现代社会走向所起的关键性影响，一般都涉及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社会改造兴起原因等问题。如李泽厚认为“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

激烈的政治改革终。政治，并且是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又成了焦点所在。”[14]对于李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有学者称为这是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化诠释。[15]

(5) 五四后出现社会改造思潮是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对于五四后的思想转向，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一些学者开始运用一些新理论、新方法来说明。他们虽然没有具体论述社会改造问题，但对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美)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从现代性与中国道德理想的价值冲突，来诠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兴衰隆替。他认为，现代化与中国的道德理想及价值观具有深刻的冲突。而马克思主义式的现代化，这种冲突则不明显，这是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欣赏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认为这是完美的现代化方法。[16]金观涛、刘青峰尝试整合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范式，以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关系模式，来阐释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更替，对现代主流的二元论自由主义传统的排斥，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意识形态的接受，以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为毛泽东思想，皆与中国一体化社会结构和一元论思想结构，以及其以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文化模式，显示了中国思想变迁的“长程模式”。[17]与墨子刻的价值理念分析相比，金、刘关于中国思想之现代转型的宏观思想史诠释，更注重思想结构的分析。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关于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危机”及重建合理性的理论，对于阐释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也颇有启示。麦氏指出，当一种传统按其自身标准已无法再进步，其固有的探究方法已经失效，并且其信仰结构内部已经没有资源解决新问题之时，认识论危机就发生了。而解决认识论危机的新理论范式，需要满足三个高度严格的条件：一是必须给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二是必须能解释旧传统陷于危机的原因；三是展示新的理论范式与规定该传统的那些共享信念之间的某种基本的连续性。[18]此说虽是西方伦理学史的分析范式，但也可以阐释中国现代转型背景下发生的社会改造问题。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儒家传统最深刻的危机，是其缺乏现代化动员和现代社会整合的文化功能。在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自由主义虽可满足批判旧传统和建构新价值范式二条件，但其与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理念之间具有深刻的断裂性。而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功能，而且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某种价值的亲和性与同构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竞争中胜出，而成为中国社会重建的新思想资源。[19]

唐德刚则以“社会文化转型论”，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演变。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由传统中国的强国家模式向现代欧洲的强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新文化运动原是一个“启蒙运动”，继之而来的则是“启蒙后”的问题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的西化一分为二，胡适选择了杜威，陈独秀选择了列宁。五四以来70年中国的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的斗争的结果。[20]他没有对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问题”和社会改造的思考加以关注。

(7) 关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转向，朱学勤从近代英美政治思潮和欧陆政治思潮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近代中国所吸收的欧洲政治思潮，如抽象还原为观念原型，大致可分为英美型和欧陆型态。前者以宪政主义为政治设计，以自由主义为政治评论，或可称改良思潮；后者前期以无政府主义后期以社会主义为革命要求，或可称革命思潮。”“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这两种思潮在中国激烈角逐的反映，杜威与罗素在华讲演直接启蒙中国知识界的自由主义要求，欧洲革命思潮(前期以法国大革命，后期以苏俄布尔什维克为代表)，在中国也有长足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新文化运动随之分裂。自由主义与革命激进主义者共同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亦随之结束。欧陆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此转折。[21]他认为陈独秀的作用确实是扭转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进中国铺平了道路。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对当时的左倾青年也产生了很大的文学魅力。[22]他从思想史上对两种思潮的区分及其选择的论述(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高力克，[23]他引用了比较现代化的观点[24])，对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从知识社会学的观察是有启示的。

(8) 有学者认为社会改造思想并不是在工读互助运动失败后才出现的。它始终伴随着无政府主义兴起而盛行。只是在1920年春天之后，当种种个人道德修养的实践作为完善社会的手段不断碰壁时，社会改造的观念在中国激进分子的心中占据了更为显著的位置。[25]李泽厚在《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比实用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大的接受性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具有中国化的特点，一是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二是道德主义。李大钊便把伦理、人道、精神改造与阶级斗争、社会改造即所谓“心与物”“灵与肉”相提并论，要求作双向的同时改造。这就是李大钊所理解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26]以上都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胜出的原因及与中国传统的某种关系，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价值理想的冲突及其批判则关注不够。

二、五四后期社会改造思潮中的思想分歧与思想走向问题

在这场社会改造思潮中，在对社会改造的目标、途径、主体力量及指导理论“主义”选择的讨论中，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流派粉墨登场，并逐渐形成激进主义(社会革命)、自由主义(渐进改良)、文化保守主义(以强调文化、精神因素的现代新儒家为代表)三足鼎立的思想格局，展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之初对于社会改造、解决“中国问题”的三种思想路径和走向。对于社会改造思想的不同走向，学者的认识也是有变化与分歧的。主要的观点是(1)认为社会改造的思想分歧反映了西洋工业资本社会思想与中国固有的农业宗法封建思想对抗。如30年代，郭湛波将陈、胡、李、吴诸人作为前者思想的代表，梁漱溟代表后者。[27]梁漱溟当然坦承他的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想与陈、胡等人不同，但他坚决拒绝把他看作保守反动，是思想革新运动的障碍，“是他们的敌人。”[28]这说明，在社会深刻变动的时代，常有人批评不同观念者“反对改革”。而学者在研究时，也采取了简单的两极化的对立分析模式。

(2) 认为是在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代表的是丁守和，李新、陈铁健，虞和平等人的著作，一般都将社会改造思潮列为专节，定义为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论争。[29]这是解放后多年来主导的话语模式。

(3)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五四后的社会思潮转向放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两者分立，或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三方分立的框架内分析。(美)周策纵将1920-1922年称为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和政治上的分裂时期。“自由主义分子倾向于避免政治纠葛，鼓吹应通过教育和文化运动实现改革，而社会主义者和国民党更多地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进步党则处于两者之间。”“在当时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必须正视的紧要问题，但自由主义者至少与其他人一样，没有研究这些紧迫的问题和提出任何假

的或最后的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1920年，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向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自由主义者却很少参加这种社会调查和劳工运动。”[30]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分子的态度另一个根本不同点，即反映在他们对政治活动和文化改革何者更为重要这个观念上。周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他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分别的深层原因，没有对社会改造思潮展开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前后民族危机中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的先导，这一思潮逐渐由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俄罗斯民粹主义，转向兼备超越的价值理想和现实的革命方略的马克思主义，而主张渐进改良的自由派则由于疏离时代要求而在“社会改造”的大潮中渐失影响力。而作为对五四后“理性化”与“西方化”运动批判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以重建终究关怀和保存文化认同的主题，保持了现代化运动之价值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张力。[31]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理性与乌托邦”一章评述了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改造的理论与方法。认为“尽管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与同时代的西方自由主义同道者一样试图以社会改造为目标，但其‘理性崇拜’意识却倾向于将社会改造首先视为一种思想文化的改造运动。”[32]在理论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社会改良主义者，提倡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但由于重视和夸大“理性”的作用，表现在提倡“文化基因”改造工程，将整个社会组织与结构完全视为人为的产物，从而认为社会改造应该通过理性的设计加以完成。自由主义者在社会改造问题上陷入了理性的误区之中。虽然作者对形成理性崇拜的原因有所分析，但对知识学的来源则分析不够。

姜义华虽然指出了中国启蒙运动具有理性缺位的特征，[33]但对于五四启蒙理性的缺位及社会改造思潮中对理性批评的关系还缺乏分析。实际上社会思潮兴起后，李大钊等人已经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理性的缺陷有明确的认识，指出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经济条件和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为根据，不能以人的理性为根据。[34]张天行指出1919年是中国思想界发生分化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这用林毓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经”观点难以解释。1919年后陈、李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主张新文化运动要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要进行两种文化运动，即精神改造运动与物质改造运动，与初期的观点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同时，自由主义派的胡适也开始谈论政治。对于这种转变的原因，作者指出，李陈等人提出的重视经济、政治变革，显示了一定的合理性。只有通过由教育导致的社会文化变革才能达到政治改变的假定模式，深深阻碍了自由主义者走上更广阔的道路。[35]至于为什么合理，作者还是采取传统的方法，并没有深入地分析。

有的学者以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社会改造思潮高涨阶段有关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人生指导作用和理论基础的论战)为例，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关于现代人生观理论基础的论争，[36]最近又认为，这也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五四后的社会改造思潮，也存在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思想冲突。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37]

对于五四后期社会改造思潮兴起后形成的三大思想路向，从目前看，国内外学者都不同程度的认同。国外学者一般称为激进主义(以无政府主义者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自由主义(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勱等为代表)[38]，国内一些学者则称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三足鼎立、对立互动。[39]有的学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论争中论述他们的思想分歧。[40]虽然各自强调的着重点不同，但都看到由新文化运动的相对一致(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到五四后期的思想分裂，并逐渐形成这三大思想格局或走向。虽然对这种思想格局的特点等问题都有所揭示，但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必要。如自由主义者的胡适是首先提出在社会改造中要重视具体“问题”的研究，但他自己及其同人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却非常有限，而主张要重视“主义”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却更为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在社会改造思潮高涨时，他们对于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妇女问题、自杀问题、宗教问题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讨论和论战，使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对于社会改造的对象和目标，社会改造的主力军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不是他们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组织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支持、赞成和参与“国民革命”的重要原因?是不是重视“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和重视“文化”与“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疏离“社会革命”和“国民革命”，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格局中不占主导、渐渐处于边缘的重要原因?

三、对社会改造思潮高涨时对社会问题讨论的研究

在社会改造思潮高涨时，由于主张渐进改良的胡适强调要研究一个个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热心社会问题人士的重视，结合社会问题的调查和讨论探讨社会改造的方法和道路是当时学界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因此近年来学界的研究也涉及到这些问题。刘一皋就《新青年》对当时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家族问题、自杀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的认识和讨论，对于社会改造的对象和目标，社会改造主力军的认识作了简要分析。认为当时社会改造的手段和主张越来越激烈，是与对于中国社会认识及描述的模糊和矛盾性有关，认为这是当时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中生搬硬套的原因。对于出现解释上的跳跃和变化，他没有深入分析。[41]

五四前后发生的自杀事件是当时社会改造思潮中讨论的重要社会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转型角度对此有所分析。即社会转型加大了社会冲突和人际冲突，急剧的社会模式转变和价值取向更换，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思想紧张和行为冲突，是自杀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42]处于新旧交替、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往往会出现人格分裂的现象，也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原因，[43]我也在一篇分析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时指出[44]，五四思想家对引起自杀的社会原因的分析中，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缺陷；而对于自杀救济的两种途径，人生观的改造和社会制度改造的倡导，也是社会改造思潮中对社会问题探讨的一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45]五四时期的自杀事件正是这样的活事件。这反映了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关系。

在对于五四前后妇女自杀事件的研究中，他张庆认为围绕着“赵女士抗婚自杀引发的人生观论争”有两大问题，即自杀的环境和自杀的态度——自杀的人生观问题。[46]当时讨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构传统贞节观，批判传统婚姻制度的腐败和社会制度的黑

暗，破除传统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为节贞而自杀的社会正当性。有的研究则从这种殉身反抗却又又是潜意识的独立人格觉醒，说明其自杀与妇女解放思潮的关系。对自杀事件的研究和讨论，促成了毛泽东注意研究和讨论社会的实际问题，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和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47]（美）林毓生对梁济自杀的研究主要是说明他是献身于儒家理想的结果。[48]提出梁济的自杀是属于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使命的一种献身方式，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价值取向是有帮助的。还有从理想主义角度解读梁济的自杀，并将他与屈原联系起来。认为理想主义者更沉醉于内心完美的道德标准的设计，注重构建和完善。他像屈原一样，不是殉国，而是殉了自己遥不可及的理想。[49]这是理想主义的价值建构。

妇女解放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关注的问题，但前期和后期有一些差别。“五四”后期社会改造思潮兴起后，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前期强调个性的独立，那么五四后对经济独立问题特别强调。对此，有的学者虽然没有分的很清，但也注意到对妇女经济独立问题的探索，是附着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各种改造社会思潮之中的。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具有西方文化色彩，是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性等各个层面的完整体系；妇女观的引进、宣扬和实施主张方面，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如李大钊侧重于阶级斗争、周作人偏重于素质教育等等。其总体特色是西方的、完整的和个性化的。[50]他实际上注意到了妇女解放观的知识学来源与言说方式。有学者从妇女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妇女解放与男性解放的对立对当代妇女解放运动出现的困惑做了分析，认为应当把提高妇女素质作为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同时还要寻求女性与男性、社会与家庭的协调发展，此乃目前妇女解放的新出路。[51]该文虽然不是研究五四前后的妇女解放问题，但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我们还是有启示的。有的认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有极其明显的男性化特征，女性的作用有限，这与妇女的知识和学问程度相关。五四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女性群的出现，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者指出了知识女性在妇女解放中的重要性，但并不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52]

宗教问题也是社会改造思潮中讨论的重要问题。有的学者对五四时期宗教的理性讨论、情绪化的反宗教、以及知识界对宗教形成的冷漠态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理性观、人文价值与宗教信仰的角度，对五四时代的宗教思潮进行了讨论。[53]并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从认识论、社会学、伦理学角度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作了概述。虽然还不是从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但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还有学者从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主旋律的角度，说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关怀的，是救国救民之道，宗教若能解决中国即时之需，它才能有保存价值。这是影响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基督教观的一个直接因素。[54]有的学者考察了“五四”时期以陈独秀、郭沫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坚决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并在反对佛教空观思想的过程中，逐步走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但他们侧重于确立信仰过程的考察，对于依据什么样的知识学看待这两者的关系考察不够。[55]在宗教问题上，五四思想家们提出了用某种替代物（科学、美育、道德、哲学）等代替宗教的问题。在社会改造思潮高涨时，对这些问题还在热烈地讨论着。学者们在研究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杨泽波认为，梁漱溟所说的道德代宗教，其实就是理性代宗教，而理性代宗教，其实就是仁性代宗教。有了作为理性的仁性，中国人不需要西方哲学的目的论体系或神学体系，本身就有一种自然向上实践的不懈动力，就有一种知之必行的力量。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这就是著名的道德代宗教说。[56]杨文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虽然他注意到理性与儒家思想中仁性的相似之处，但不是从知识学的角度说的。有的学者从宗教与近代政治、文化蕴涵，及与道德、科学的关系分析这个问题。[57]周策纵对于当时反宗教的理由（科学等）做了简要的分析。[58]我初步从知识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论证。[59]

劳工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也是当时在社会改造思潮中讨论的重要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也较多。[60]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总的看，从历史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的比较多，而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社会改造思潮进行研究的较少。再就是没有将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与社会改造思潮紧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社会改造思潮中重点是对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不合理的论证，这种论证各派所依据的理论与知识又有很大的不同。这是需要引入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度研究的。

四、社会改造三种思想走向知识学的依据和选择问题。

三大主要思想走向对社会改造的主张，似乎都有其“主义”选择的理论性、知识性依据，这与当时新知识、思想、理论的不断引进有关。早在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时候，随着杜威、罗素来华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著作翻译出版，社会改造所依据的主要知识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现在中国思想界。这既是当时的思想界对社会改造产生不同思想路径的知识学依据，杜威的讲演录在当时公开出版的主要有《杜威五大讲演》[61]。杜威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讲演中直接谈到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罗素来华讲学后，其著作《社会改造原理》[62]、《罗素的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63]、《中国的问题》[64]出版，以后不断再版。从此罗素的“占有冲动”与“创造冲动”的生机主义理论以及柏格森（代表著《创造进化论》），杜里舒、倭坚的生命哲学以及稍后的泰戈尔对东方文化的颂扬，开始成为以梁启超、张东荪、梁漱溟、张君勱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论述社会改造的知识学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各种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也在社会改造的讨论中被大量介绍翻译和出版。主要有《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及新青年编辑部编《社会主义讨论集》（广州，1922年）等，在当时社会改造思潮高涨时，还出版了《社会改造八大家》[65]，将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罗素、托尔斯泰、莫里斯、卡彭特、易卜生、爱因斯坦等称为社会改造的八大家向国人介绍。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的运行方式。中国的社会特征是礼教社会或像梁漱溟说的那样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当这个社会每次面临危机时，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提出的改革社会的目标，都是重新恢复或达到原来的理想社会。而改革的理论依据，都是“法先王”的理论，是“向后看”的理论，或者将孔子与儒家的学说作为改革的知识学依据，认为社会的良性运行首先基于人格的完善与道德水平的提高。只有全社会崇正学（儒学）、每个人做正人君子，社会才能具有良性发展的基础。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是历代知识分子孜孜一求的目标。就是到了近代，新的知识学进化论等理论已经流行时，

康有为为了变法还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提出三世循环论，为改革寻找理论根据。

然而，戊戌变法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民国的建立，社会的根本转型，社会的变革的理论 with 知识学依据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不但儒学失去了唯一合法性依据的地位，“向后看”被彻底的“向前看”所代替，就是西方来社会理论如进化论等也不断被新的理论所代替，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家们不断否定的理论，而采用最新的理论作为改革依据。这种现象，仅仅用历史学的方法分析是不够的。

近年来，学界开始尝试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二十世纪的学术思想来看，知识界一再调整、修正学术的知识结构，是被什么问题所纠缠？刘小枫认为，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实质问题是现代现象。现代现象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人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就显为双重性的，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是中西的冲突。用知识社会学来分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观察现代结构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样态，同时关注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动，以阐明思想与社会的一种同构关系。应该说，这是知识社会学的思想史分析。[66]我们以此视角观察，五四后之所以发生社会改造思潮，正是在这种古今中西冲突的大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时，运用当时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新知识，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思想批判、以及重建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知识学依据。而当时对妇女、劳工、自杀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即反映了思想界对当时“中国问题”的关注，也说明了社会改造思想的产生具有一种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

从现代中国的语境来看，无论社会层面还是思想层面的现代性研究，都是颇富刺激性的。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开端和现代性问题的起点都是从民族比较开始的。[67]何谓“中国问题”？简单地说，它指晚清士大夫看到的中国所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正当性均需要重新论证。这种论证需求是由西方现代性逼出来的。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看“中国问题”的具体定位：在历史事功层面，问题是作为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富强，在国际（国族）间的不平等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问题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理念的冲突如何协调，民族性价值意义理念和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获得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的意义层面，问题是如何维护中国的传统终极信念的有效性，设想其解放力量不仅对中国有效，也对西方有效。[68]从这个角度看，当时对于解决“中国问题”而发生的“问题与主义论争”、“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及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都是试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人思考“中国问题”时采用的知识学工具，构筑社会改造理论，已与晚清甚至新文化运动初期知识人有了明显的不同。晚清知识人主要思想资源是传统经学，清末民初引入西学和种种“主义”话语，更换了知识资源。从当时几种不同的知识学路向看，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等人主要依据进化论，那么五四后则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知识学或理论工具，因此形成了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路向，而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从对生物进化论的批判，对社会进化论与互助论和儒学的推崇（杜亚泉），到主要运用生命哲学与儒学知识学的文化哲学路向（梁漱溟、张君勱等）、实证科学路向（胡适、丁文江等）、人类学——社会学路向（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改造的民族化路向以西方的知识工具来担当，是当时中国人的共通点。当然，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大同思想仍有相当影响。[69]

“主义”话语的纷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主义”话语要么在为某种社会行动辩护，要么在鼓动某种社会行动，它具有了社会行动的功能，成为社会实在的一个结构因素。所谓“主义”话语，就是带有价值论断的社会化言论，这些论述以某种知识学（科学）的论证来加强价值论断的正正当性，促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当某种话语进入社会化推论和诉求时，或当某种由个体提出的思想论述要求社会法权时，思想论述方转为“主义”话语。一旦“主义”话语获得社会法权，就成为意识形态。因此，必须区分三个不同的话语：个体言说，“主义”论述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已与制度化的政治-经济秩序融构，“主义”话语尚在谋求支配这种秩序。）进而，这三种层次的论说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十九世纪至今的知识社会充斥着“主义”话语，带出了各种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的社会行动。“主义”话语标明了生活样态及其社会制度的现代变迁中社会思想的转型，因此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现象：恰恰在现代化愈为复杂的社会中，“主义”话语更为丰饶。如刘小枫以中国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话语入手，引出“主义”论述的问题性：个体信念及其言说与知识学及其社会性的关系，究竟怎样的。知识社会学探究思想与社会的关系。现代共产主义思想是随无政府主义之后进入知识界的，前者的“主义”诉求在历史的社会政治行动中成功地建构起民族国家，并成为意识形态。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的观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社会改造的三个思想走向是有启示的。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实证科学与自由主义、以梁漱溟、张君勱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无疑是当时有关社会改造的三种主要的“主义”论述。而之所以形成了以他们为代表的三种走向，则是以他们个人的言说开始的。以各人言说为中心，形成了与他们类似论述的思想派别，并以他们为中心开始了实现其理想的社会行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决定性变化之一，是社会制度的正正当性论证，逐渐脱离传统的汉语思想界，采纳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思想。以种种“主义”为标识的“科学的”社会知识，取代了传统的汉语社会思想的理念，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新兴的知识学科中找寻社会制度正正当性的论证资源。而这些正是现代型（科学的）的知识。就是像梁漱溟等新儒家，也以现代生命哲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展开论述，而这些理论也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或是内涵了科学知识的。他们以“科学”公理论证普遍公义的理想社会，并据此抨击欧美各国的现代（或立宪、或共和）政体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抨击民初以来国家的制度性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在文化论战中分析中国文化和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妇女问题、自杀问题、劳工问题、人口问题等的研究和讨论中也大量的运用了这些知识学，表明中国当时知识界在社会改造思想的分化中，已与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思想冲突相一致。同时这种运用知识学对社会改造的正正当性论证，也为各自具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社会动员和社会行动提供了价值论证。

从现代社会知识学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社会理论样式，马克思“主义”的与韦伯个体的社会理论，以及舍勒的知识论类型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论看，五四后在社会改造思潮中对社会问题的诊断、对社会制度与社会思想的批判，对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及理想

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是与社会化的个体信仰、“主义”话语与世界观的现代性、公共论域中“主义”话语竞争相关的。由于五四后是中国思想界“主义”论争的烽起时代,一些“主义”的知识学加入了现代性的新内容,往往是人们接受并作为社会改造知识学依据的重要原因。如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义”论述,在以前乌托邦式的“主义”论述基础上,加入了以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以经济生产和分配制度为主干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证,作为价值理性的“主义”话语就与某种历史社会知识学的实证论述结合起来。[70]史习基认为,五四时期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改造构想的论证,既坚持以“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造,又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的研究。[71]可以解释五四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学方面的原因。如“问题与主义论战”后,陈独秀发表《主义与努力》这篇随感录,不再纠缠于“问题”与“主义”孰轻孰重的表面文章,而是将其转换成“主义与努力”的论式,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毛泽东也将主义与问题皆划入“问题”来研究,形成了李大钊、陈独秀式的思想模式:一方面有“研究实际问题”的“努力”,另一方面又有“宣传理想主义”的“方向”。他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以后注重“运动的方向”,是与他前期注重将“主义之研究”优先考虑分不开的。这就将“主义”的论证与社会行动结合了起来。[72]

实际上,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在激烈转变的动荡之中,以及西方思想和知识的不断引进,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当性不断受到怀疑,论证现存社会正当性的社会理论的正当性也不断出现危机。从当时的世界看来,社会理论一直在为合理的、正当的社会制度探寻正当性根据。知识社会学提出的是社会理论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因此涉及社会制度之正当性的二次论证。在这一意义上讲,知识社会学问题显明了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的重大转折面临的根本问题。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说的冲突,源于形而上学的、宗教式信念与经验理性的社会知识的混淆。大多信念式的社会论述,都带有不可验证、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这在现代新儒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实证的经验理性的知识原则为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了论证工具,并成为这一制度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知识论与传统形而上学之争是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之争。实证的知识可以是普遍性的,形而上学知识的普遍性相对而言要弱一些,获救的知识最少普遍性。舍勒的知识类型论提供了一个恰切的知识社会学原则,有助于到位地审理个体信念与社会制度的正当论证及知识类型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五四前后,青年毛泽东为了寻求社会改造的“大本大源”,而研究哲学、伦理学,实际上也是从中西哲学思想中寻找社会改造思想正当性资源。哲学、伦理改造只是社会改造的手段和路径。[73]从三派在对宗教、文化、科学与玄学等问题的论争看,涉及形而上学、世界观等知识的论争,在对社会改造理论的知识学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和辩难中使社会改造思想更加深入。

另外,这次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原因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法家关于社会的思想是怎样的关系?与近代以来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对理想社会或大同社会的追求或建构、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与一战后西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世界格局的调整关系是怎样的?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型看,这次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对这种转型起了什么作用?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对社会问题的诊断及其解决方式的不同如何导致了这三大思想路向的形成,以及社会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兴起?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而言,社会改造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十年代更发展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造运动,二十年代的社会改造思潮与之有什么关系?这些对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和谐社会有怎样的教训和启示?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作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1] 参见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37-38, 这与西方近代思想对社会的发现不同,参见波兰尼(Karl Polanyi),《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

[2] 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3] (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83、17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3月3日开始连载《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即《欧游心影录》

[5] 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现收入《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第21卷第17号(1924年9月10日)

[7] 诸青来:《社会改造问题》,启智书局1932年出版

[8]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9-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9] 金冲及:《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祭》,载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0] 王章维:《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参考》1989年5月4日

[11] 金耀基:《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12]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一卷第175、22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

[13]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启动与抉择》第579-580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6、33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15]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第280页,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16] (美)墨子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觉问题》,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第200-20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 参阅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1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 (美)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第473-47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19]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第283-284页,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20]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35-57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21]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74、96、127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22]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206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 [23] 高力克：《〈新青年〉与两种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
- [24] (美)西里尔·E·布莱克(Cyril E. Black)：《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年版)
- [25] 顾昕：《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开放时代》1999年4-6月号
- [2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6、33页, 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 [2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34-135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原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版)
- [28] 《梁漱溟全集》第4卷, 第73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29] 丁守和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63年第一版, 1978年再版)
- [30] (美)周策纵著、周子平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07、311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31]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第13章,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 [32]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34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33]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第2页, 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 [34] 《李大钊文集》(4),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35] 张天行《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化约倾向与突破》，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345-359页
- [36] 刘长林《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0期,
- [37] 刘长林《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 [38]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另参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分《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三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2年版
- [39]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67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许纪霖：《二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 [40]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1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41] 刘一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新青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描述》第1189页
- [42] 齐卫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自杀现象》，《民国春秋》1998年第3期, 王合群：《二三十年代上海自杀问题的社会透视》《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乔素玲：《痛苦诀别:1920年代广州市民自杀透视》，《广东史志》2002年第3期
- [43] 张光芒：《民初文化界的自杀风潮》，《粤海风》2000年第4期
- [44] 刘长林等：《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 [45] 《毛泽东早期文稿》414页,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
- [46] 张庆：《20世纪中国人生观论争》第18-31页,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47] 齐卫平：《试析毛泽东关于长沙赵女士自杀事件的评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
- [48] 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205-223页, 三联书店1988年版
- [49] 《站立出理想主义者的姿态》2004年10月12日00:05:54 网易文化
- [50] 汪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的几个层面》，《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 [51] 杨世宏：《妇女解放的困惑及出路》，《妇女研究》<人大复印>1998第4期
- [52] 畅引婷：《中国近代知识女性与妇女解放》，《妇女研究》(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第2期
- [53] 唐逸：《“五四”时代的宗教思潮及其现代意义》，载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2000。
- [54] 梁家贵：《矛盾·崇尚·敌视——20世纪初期陈独秀基督教观之演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 [55] 哈迎飞：《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郭沫若、瞿秋白的佛教文化观透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 [56] 杨泽波：《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论梁漱溟儒学具有宗教作用之学说的理论意义》河北学刊0303
- [57] 董丛林：《孙中山宗教观的近代政治、文化蕴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01
- [58]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441-448页
- [59] 刘长林等：《试析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的思想》，《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 [60] 参见赵毓坤：《劳动问题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刘忠：《走出现代化问题的双重困境——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演进与求索之路回视》，(加)《文化中国》2003年第1期, 等
- [61] 《杜威五大讲演》上海晨报社1920年8月版
- [62] 《社会改造原理》(余家南译)由北京晨报社出版, 民国九年十月一日(1920、10、1)
- [63] 《罗素的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北京新知书社1922年出版, 另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版, 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书斋里的革命》。
- [64]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1922, Bolshevism;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1920)
- [65] 商务印书馆1921、26、27、31年版
- [6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问题绪论》，第193页,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 [67]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t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3
- [68] 五四前后思想界从全球空间视角产生了对中国问题的新界定, 参见程农：《重构空间：1919年前后中国激进思想里的世界观念》，《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
- [69] 辛受爱：《毛泽东早年的乌托邦思想》，《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 臧世俊：《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第292页,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 [70] 这与人们理解的经济决定论不同, 参见杨奎松等：《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第8、9章
- [71] 史习基：《论李大钊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探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0期, 另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9。
- [72] 董德福、史云波：《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 [73] 孟毅辉、彭继红：《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论要》，《湖湘论坛》2003年第6期